

△ 要 目 △

- 全国第二次省级地方志刊物
主编座谈会综述
- 科学技术志编写的几个问题
- 《综合经济志》浅说
- 关于财政志编写的几个问题
- 志书修完后怎么办
- 整理资料长编工作程序

贵州 方志

**GUI
ZHOU
FANG
ZHI**

1988

5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贵

州

方

志

目 录

5

1988

第五期

总 42 期

全国第二次省级地方志刊物主编座谈会综述…………… (1)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在贵阳举行……………美 贵 (3)

方

志

论

坛

科学技术志编写的几个问题……………张桂江 (4)

《综合经济志》浅说……………孔和森 (10)

地方志书的纪年……………梁滨久 (11)

试谈如何用十三大精神指导修志工作……………杨通福 (13)

关于财政志编写的几个问题试析……………伍常安 (15)

县志地理志编写管见……………禹明先 (19)

新方志的讨论来个重点转移很有必要……………朱祖周 (22)

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导编修宗教志……………张 坦 (24)

当前修志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周永光 (26)

浅谈编写《民族志》中的几个问题……………吴展明 (33)

三宜三不宜析……………朱五义 (31)

方志功能之我见……………韩章训 (29)

人

物

志

编

写

人物志的“志传”与“本传

的写法问题……………谢尊修 (36)

在人物立传问题上

理论依据的探讨……………刘东木 孟庆云 (38)

人物志编写浅见……………黄前进 (39)

修 志
从 谈
业

十、志书修完以后怎么办……………陈梧山 (42)

工 作 研 究	县志叙事地域范围探讨.....梁云星 (44)
	资料考证浅议.....文 郁 (46)
	总纂《思南县志》的体会.....黎世贵 (48)
	科技志“概述”浅议.....吴学林 (50)
	编写林业志的体会.....贺廷显 (53)
	整理资料长编工作程序.....程树棠 (55)
	石阡县妇联志编写简介.....张安邦 (57)
	微生物入志管见.....文朝汉 (58)
旧志研究	读民国《息烽县志·序》.....邱德林 (59)
志书评介	浅评《贵州省志·民族志》篇目.....吴 辛 (61)
方 志 摘 编	解决《群团志·工会篇》与其它专志的交叉..... (2)
	带县的市志怎样写..... (10)
	城市志的核心层次..... (25)
	地方志与地方文化..... (41)
	当前方志评论的弊病..... (60)
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朱文华同志逝世..... (封二)	
一九八九年全国地方志刊物联合征订..... (62)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地 址：贵阳市延安中路十一号二楼 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日出版	

全国第二次省级地方志刊物主编座谈会综述

全国第二次省级地方志刊物主编座谈会，于1988年8月18日至21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这次座谈会是根据第一次会议的决定并得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支持而举行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国地方志》和《黑龙江史志》、《四川地方志》、《志苑》（安徽省）、《山西地方志》、《天津史志》、《江苏地方志》、《浙江方志》、《广东史志》、《甘肃史志通讯》、《山东史志丛刊》、《江西方志》、《修志文丛》（江西省）、《贵州方志》、《内蒙古地方志》、《广西地方志》、《方志研究》（吉林省）、《方志天地》（辽宁省）、《福建史志》、《湖南地方志》、《南京史志》、《哈尔滨史志》、《羊城今古》等23家省（市）和计划单列城市地方志刊物的分管主任、主编、编辑，还有《黑龙江档案》的副主编，共33人。会议由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秘书长曹夫兴主持。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陈雷，省顾委副主任、省志委副主任张向凌到会祝贺并做了简短的讲话，省志委常务副主任杨富贵参加了会议并在座谈结束时讲了话。现将讨论内容摘要综述如下：

会议认为，1986年四川乐山首次省级地方志刊物主编座谈会围绕办刊宗旨、提高质量、加强联系等问题的讨论，对办好刊物是有益的。时过两年，地方志刊物有了很大发展，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发行量也逐步扩大。但十三大的召开，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的召开、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七、第八次会议的召开、各地修志工作多已进入编写阶段使形势又有了新变化。这就要求地方志刊物的质量要再提高一步。会议认为，在这种新形势下召开第二次主编座谈会是必要的。

关于贯彻十三大精神。会议认为，目前提高志书质量的关键在于贯彻十三大精神，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地方志刊物要组织一些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导方志编纂的稿件；编辑人员要解放思想，勇于开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把自己的工作和十三大精神、党的基本路线紧密联系起来，认真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提高志书的政治质量“推波助澜”，努力编出符合时代精神的刊物。

关于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大家认为，刊物的宗旨、编辑人员的素质、稿源等，无不与此相关。与会同志分析，目前全国地方志刊物办刊宗旨有好几种，而多数是属于“机关刊物”，这类刊物有综合性的特点；第二类是学术性较强的刊物，这类刊物的内容以方志理论、编纂经验为主；第三种类型的刊物是偏重于史料的；当然也有其他类别。大家认为，对刊物的宗旨不要硬性规定，应允许多样化。只要认定自己刊物的宗旨为修志服务、为繁荣新方志学服务乃至为社会服务，不断坚持改革创新、百花齐放的方针，刊物的质量就会更上一层楼。

编辑人员的素质是关系刊物质量的主要因素。大家认为，要办好刊物，就要提高编辑人员的素质：一要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努力杜绝人情稿；二要提高业务素质，主要是扩大知识

面特别是社会知识面，并尽可能多地掌握修志信息、理论动态；三要广泛地联系作者。

稿源问题是关系刊物质量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大家认为，面对“来稿丰富，可用者少”的局面，一定要化大气力组稿，不能等米下锅。要挖掘新课题，有针对性地组织稿件。譬如，尚未开展的新志书的评论、比较薄弱的方志理论研究、编纂中遇到的难题、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照检查志稿等都是值得开拓的领域。有水平、有深度的稿件多了，刊物的质量也就上去了。

关于联系实际指导修志工作。大家认为，目前地方志刊物要千方百计为提高志书质量服务。至于地方志刊物如何具体地指导或引导修志工作，是由其办刊宗旨决定的。不同的宗旨决定刊物从不同的角度指导或引导修志工作。有的侧重从方志基础理论上指导，有的侧重从方志编纂理论与业务上指导，有的侧重从基本史料上指导，有的从方志工作经验的总结上加以指导。但无论哪种形式都要加强调查研究，不能脱离实际。

关于如何增强地方志刊物的生命力问题，大家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认为，地方志刊物在主要为修志服务的同时，可以面向社会，开放办刊，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并且随着修志任务的逐步完成，还可以扩大这方面内容的比重。地方志刊物生命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它的实用价值。应该注重社会效益，适当考虑经济效益。

此外，座谈会还对稿酬、编辑费、审稿费、联合征订、发行、价格等一些办刊具体问题进行了议论，交流了情况。

座谈会在一稿多投现象反应强烈，一致认为应呼吁制止这种现象，并采取不发稿酬、在刊物上批评等具体办法。



解决《群团志·工会编》与其它专志的交叉

1. “职工队伍”，《人口志》略写，《工会编》详写。
2. “劳动保护”、“劳动保险”、“劳动工资”、“福利”等，《劳动人事志》要从立法角度记述，《工会编》要从工会的职能监督角度来记述。
3. “劳动保护”，《医药卫生志》侧重于专业技术角度，《工会编》侧重于自己的工会工作。
4. “女职工及家属工作”、“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职工家属工作《工会编》要详记，《妇联编》不记。“五好家庭活动”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内容，《妇联编》要详记，《工会编》不记。
5. 《物价志》中的“物价监督”；《体育志》中的“职工体育”；《文化艺术志》中的“职工文化和职工文艺活动”；《教育志》中的“职工教育”等，这些与《工会编》交叉的内容，均由各专志详细记述，《工会编》不作记述。
6. 其他各专志记述内容与《工会编》交叉时，说明工会组织在各项活动中所起的地位和作用就行。

(摘自《黑龙江史志》

88·3)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 规划会议在贵阳举行

中共贵州省委于1988年9月9日至10日在贵阳召开全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工作会议。这是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次盛会，标志着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省委副书记刘正威、丁廷模、省人大副主任徐挹江、副省长龚贤永、张玉芹、省政协副主席蹇先艾等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及各学会，省级机关研究组织及地州市代表200多人。省地方志协会副秘书长张桂江参加了这次会议。

省委副书记、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丁廷模在会上作了报告。他在总结改革十年以来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状况以后指出：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在四个方面作出新贡献。（1）拓展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研究，深化对贵州省情的再认识。（2）加强对改革时期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发展生产力作理论上的支持和指导。（3）正确认识和处理现阶段各种社会矛盾，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4）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丁廷模同志进一步指出，为繁荣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待马克思主义，一要坚持，二要发展。要以实践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抛弃已被实践证明的不正确的个别论断，不断补充新的思想材料和科学观点，使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发展。理论工作者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省情出发，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作出新概括，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形成新学派。社科工作者要面向实际，投身改革与建设，认真研究，提出对策和方案。不要忙于发议论，盲目移植新名词新概念。发展社会科学要贯彻“双百”方针，创造民主、团结、和谐、融洽的环境。不能以僵化观点看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能以自由化观点看待改革开放。理论研究无禁区，但宣传应当有纪律。有些问题中央未决定，意见不成熟，公开宣传引起社会波动，要有社会责任感，考虑社会承受能力。他还就社会科学队伍建设提出了意见，要求各级党政领导重视社会科学的发展，关心社会科学队伍的建设。

龚贤永副省长在讲话中指出：社会科学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有先导作用。建国以来我国发展的成就与失误都与当时的理论与决策有关。但不是所有同志都认识到这一点，各级党政领导要充分认 识社会科学发 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起的作用。他要求全省社会科学工作者：（1）正确运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深化省情认识，造成解放思想舆论环境，帮助各级领导创造性地开展工作。（2）为各级党政领导提供有价值参考材料，社科成果采用率，表现社会科学的社会公认程度。（3）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将知识转化为成果，为兴

（下转第7页）

科学技术志编写的几个问题

张桂江

科学技术志是新方志的重点专志之一。科技志反映一定行政区域科技事业的历史及现状，反映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科技成果和科技水平，为科技事业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供战略决策依据；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提供历史信息；激励科技人员为提高科技水平作不懈的努力；加强干部群众对科学技术在生产建设中的地位的认识等都是编写科技志的重要宗旨。

在经济类专志中，科学技术是作为生产力的组成部分记述的，一般需作较详尽的记载。这样，就出现了作为相对独立的科学技术志在新方志中所处地位和记述内容的安排问题。在编写实践中，各地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有的主张科技志只从宏观上作概况式记述；有的主张侧重记科研机构、队伍和基础学科研究；也有的主张将全部科技内容集中记述，其他专志不作反映，或者取消科技志，分散到有关专志中去表述。各地情况千差万别，采取何种体例不必强求一致，但科技志的编纂内容安排，直接影响到体例的选择，有必要加以研究。

讨论科技志的总体设计，至少要协调以下几对矛盾：其一，科技志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宏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如果科技志陷于纯学术探讨，不接触经济与社会各部门的科技发展状况，则难以体现这一功能，另一方面，各类专志如不详记自身的科技发展状况，又难以反映现代经济的特点，势将降低志书的实用价值。其二，现代科学技术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人为地加以割裂，可能导致概念的混乱。如相同内容在科技志和其他专志中作简单重复，将增大志书篇幅。其三，科技志对全社会作宏观性概述，有可能与综合经济志撞车，科技内容在宏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记述中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科技志的综合记述也与宏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有紧密的联系。其四，现代经济管理的科学化与科技事业管理的现代化关系密切而又各有其特定概念，在记述中却常常将科技管理与管理科技相混淆。协调上述种种矛盾，需要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加以分析。

笔者接触到的一些科技志书稿，在总体设计上有三个倾向性问题值得探讨：

一、科技志中行业科技篇目的设计，有的是按照所反映行业的主体结构或生产过程来布局谋篇的。迫使这类书稿过多叙述行业的生产过程、工艺、产品及常规技术与设备沿革，甚至过多列举生产成绩、产量产值和经济效益。作者的意图是在生产过程中反映行业科技的运用及其效应。但有可能与各类专志的科技篇重复，甚至与有关生产篇章重复。而反映行业科技的特定功能及其在整个科技事业中的地位及比重有所削弱。

二、所谓行业科技，是指国民经济中某一门类或某一行业特有的科技，一般不包括辅助线的科技。例如农业的科技主要指农林牧渔业科技。农业机械的制造，应是机械工业的内涵之一，而不是农业科技必记的主体。一定时限内在某一行业内采取的特殊科学技术措施，一般也不宜视作相对独立的行业科技。例如农业机械化科技，不是国民经济中一个行业或一个

独立存在的门类，而是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所采取的技术措施。我国农业机械化在近几十年有很大的成绩，但置于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汪洋大海中，所占比重并不特别大，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问题之一。如果将农业机械化及其科技作独立记载，将难以评价其实际发挥的作用。

三、科技志应有其特定的记述范畴。由于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讨论科技志的特定内容有更为深刻的意义。需要从概念上作一些划分，即从生产与科技两个领域按照方志体例的基本特征的要求研讨记述内容分工的一些原则。大体上，科技志以科技内容为中心，生产及科技在生产中的效应是作为背景或条件材料来处理。相反，各类专志中以生产为中心，科技的运用是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条件来表述。

讨论科技志记述内容的主体，确定其“主轴线”。使所编写的书稿在全志中地位突出，比例得当，仍需从研究科学技术所具有的特殊属性入手。其一，科学技术事业是一种有较强的系统性、综合性和开放性的事业，而不是封闭式的自我服务的自成体系的内倾型事业。如果将科技志编写成反映科委、科协、科学院三大机关的内循环式专志，可能会失去很多读者。同样，科技管理与研究机构面向整个社会所作的工作及研究活动，也有必要加以系统反映，这就有一个划分机关内部事务与事业活动的界限问题。其二，科学技术各门学科与应用技术之间有密切联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又是相互勾通的。我们撰写理论研究、应用科学或者技术开发，都不能视作孤立存在的事物。作者笔触有必要关心每一项具体的科技活动或者科技成果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与作用。其三，科学技术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日积月累的“十年寒窗”是一种渐变过程，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或科技活动的突发性表现，“一朝成名”是一种突变，表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如果过多记载“渐变”，而不刻意写好“突变”，就难以看见科学技术进步的历史轨迹。普及与提高有点面结合及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科技水平，应有点面结合的概念。其四，科技事业人才特别密集，水平也比较高，科技志体现科学性，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学术水平要求，就这一点来说，科学技术志属于学术志范畴，重点之一是反映一定行政区域不同历史时期的科技水平。如果科技志过多罗列行政事务性工作，也是一种失策。科技管理本身是一门学科，科技管理记述在科技志中不应有所削弱，但与行政性事务并不相等。例如科技经费与财务是科技事业发展的有影响的重要因素，但一般化地罗列科技财务部门的财务行政工作，有可能与其他各类专志乃至一切财务部门工作有“大同小异”之感。

如果上述论点能够成立，科技志的记述重点，即“主轴线”，应是反映人类认识自然、控制自然的知识及能力的增长过程。科学研究成果反映的是一种理论认识，依据这种理论设计在生产工艺或产品开发上取得的突破，是其经济与社会效益的集中表现。就此而言，科学技术志不可能过多地记述生产过程中的工艺和产品开发的详细情况，更无必要过详地记载行业的生产发展及其经济指标变化。

科技志有与其他专志记述内容交叉问题，但也有交叉可能性较少的广泛内容，这也是科技志应当独立成志的依据之一。例如：（1）基础理论研究，包括在区域内的科研单位及大专院校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状况及其成果。记述似宜侧重各门基础学科的研究水平及研究新成果，当然也包括研究手段及技术设备的更新。大专院校的科学教育在教育志中，似宜侧重科研与教育结合，提高教学质量方面。这与当代国外研究中心教研用合一体制有所不同，这是我

国现阶段科技体制与教育体制的特点所决定的。(2)党和人民政府科技政策、法规的制定及执行状况。其重点是写好科技管理,要从泛记行政工作中拓展开来,记好人才管理、成果管理以及各类宏观的科技事业协调工作。(3)科学技术协会及各类专门学会和科技学术团体所开展的各类学术活动。(4)区域内科技事业发展及科技总水平。一定行政区域科学技术的影响,有两项考虑:一是对区域内经济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二是对区域外的覆盖或辐射作用。

应用技术既是科技志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他专志的必记内容。值得探讨的是:科学技术与生产活动、工艺流程、产品工艺等是“共存”的,体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命题。生产、工艺、产品开发是科学技术的服务对象,科学技术则是生产发展的条件。所从事旨在改进生产过程、工艺技术及产品而进行的技术性研究、试验,其表现为理论设计或设想,属于科技志记述范围;根据这些理论或产品、工艺、设备的设计或设想进入批量生产,或者形成新的技术、新的工艺以及所取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属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专志的记述范围。但在实际写作中,有许多需要协调的方面,其一,研究与生产是连续动作,其界限较难机械认定。其二,科技志不记述科研进入生产过程以后的状况,难以检验其实践效应,在生产中的信息反馈,又是发展科技事业不可缺少的因素。其三,其他专志记述科技内容,也不可能停留在“执行”研究成果上。当前由行业主管单位编写专志的做法,对这些单位所进行的科研活动要求舍而不记,也缺乏可行性。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化大生产中科技活动联系紧密,难分难解,对科技志与各类专志记述分工增添了难度。协调之法似可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明确记述分工,减少或防止简单重复。二是各取所重,互为因果,有主有从处理。三是划分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的相互辩证关系。

地方志是一种横分门类的资料性著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科技在科技志中形成一些横分条目,是顺理成章的作法。对于应用技术的记载,科技志的侧重内容似有:一,传统应用技术及传统名特产品技术的发掘和整理,科技志从详,在生产上的运用推广则有关专志从详。二,引进先进技术与先进装备的可行性论证过程科技志从详,引进过程和使用效果在有关专志中从详。三,新生产工具的研制科技志从详,形成新生产力以后使用状况在有关专志中从详。四,新的生产工艺的研究及试验科技志从详,定型以后在生产上的推广运用及其效应在有关专志中从详。五,新产品的研究与试制科技志从详,投入批量生产以后有关专志从详。此类事例不胜枚举,科技志与专志内容的详略,侧重取舍相互协调,可收相得益彰之效。各类专志中大量存在的常规性应用技术,即非一定时期一定范畴带创造性的新发明,例如医学上的常规医疗技术,建设工程上的常规施工技术,一般不必在科技志中繁琐罗列。

科技学术活动与科技现代化管理也是科技志的记述重点,科技事业的管理水平,特别是实施科技现代化管理,直接影响到科技事业的发展。科技学术活动及管理的宏观状况,是科技志特定内容之一。旨在推进各门学科或部门科技所开展的活动和实施的管理,在各类专志中记述从详,科技志只可能作概括性综合反映。另一方面,为增强科技志的立体感和实用价值,在区域内有重要影响的科技研究学术或工作单位,科技志有必要分别作介绍备考。科技志中详记的管理项目,似可侧重于科技计划、人才、专利、成果、情报以及科技交流合作,科技出版等方面的内容,力求压缩财务、物资、供销、后勤、政工等行政工作(不是说完全不记)的记述。

民族地区科技志，尤宜突出民族科技内容的记述，似可考虑设置必要的篇目。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地区科学文化比较落后。我国地域广阔，各个民族地区科技发展不平衡。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形成一些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科技，在农业、牧业、林业、医药方面有些技术并不落后。建国以来，不少民族地区不仅拥有先进技术装备，还形成相当规模的少数民族科技干部队伍，有的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在若干民族地区，受到我国大三线建设及工业布局调整的影响，同时存在最先进的技术人才构成和落后的农业手工业技术水平并存的状态。凡此种种，有必要在科技志中占有一定的篇幅作记述。民族科技是一种综合概念，并不特指某种专业或行业，记述上主要采取综合的方法。反映各个方面具有民族特色的科技发展状况，亦可从三方面取材：（1）记述传统民族科技。各少数民族在独特的地理环境中生息，形成独具风格的技艺，例如侗族的花桥鼓楼、苗族的蜡染等等。在理论研究上，也有许多突出成果，例如1985年由贵州民族研究所翻译出版的《西南彝志选》，记载了彝族在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上的许多传统理论成就。（2）历史上民族地区科技落后，但不等于空白。早在明代，朝廷就有吸收民族首领的子弟入太学的规定。清末民初贵州一些边远教会曾向少数民族子弟传授科技，至今健在的有些老一辈少数民族科学家，就曾由此发蒙。（3）建国后国家对民族地区科技事业的扶持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尤需集中地作表述。

科技成果的记载，有得失评价标准问题。科技事业的兴衰起伏，有政治和社会的原因。科技研究本身情况则比较复杂。良好的科技研究环境有时不一定产生划时代成果，同等科研条件不一定产生同等水平成果。科学研究一般来说，总是失败次数多于成功机遇。记述科技研究“屡败屡战”的历程，决不会为科学家“抹黑”。科技研究作为开创性活动，成功系数不可先决，失败率远远大于成功率，这是科技发展的常规。记述攀登科学高峰百折不挠的进程，将是科技志受人欢迎的内容之一。

对科技成果的实用性评价，要有历史学家的眼光。哥白尼、伽利略的成果在当时都是受贬斥的。当代科技为当代服务是主流，但也不可排斥一些科技成果的隐性功能和超前性能，由于当时的生产条件和社会认识承受能力所限，当前实用性差的成果如果随意加以抛弃，或者会受到历史的指责。

（上接3页）

黔富民作贡献。

会议审议了我省“七五”时期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和招标课题，提出调整充实意见，会后经学术委员会审定，领导小组批准后作调整。

地方志编写已列入我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七五”规划，也是我省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要内容，各地方志工作者要认真学习这次会议精神，加快进度，提高质量，为在“七五”时期基本完成各级地方志的编写任务而努力。

（姜 贵）

《综合经济志》浅说

四川蓬安县志办 孔和森

新方志以经济志为主体，在经济诸志中必须有一个起总摄作用的《综合经济志》，来记述地方经济大观，综领反映部门经济的各分志，这是目前方志学界已趋一致的认识，现就为什么要设《综合经济志》，及定名探讨，应该注重的几个问题，我们的纲目设置，谈点个人浅见，以期得到指教。

一

一个地方的经济总是自成体系，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部分组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整体和部分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整体的作用，就在于它总揽全局，统领、支配、驾驭各个局部，为全局服务，达到全局所要达到的预定目的。因此，整体的作用绝非部分的作用简单相加可比。在方志中所设的《综合经济志》，就是用系统的观点，数学的方法，对整体成分及其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方式、结构、功能进行综合考察，从宏观的角度勾勒出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总过程和总面貌。而各经济分志所记述的是各部门经济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展示的是地方经济各个侧面的面貌，在经济诸志之首，冠以《综合经济志》，总摄经济诸志，为各分志之统帅，这是系统地反映了一个地方的总体经济。即宏观经济的发展全

貌，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志，只有分志而没有综合经济志，那就成了只见百川奔流，不见百川汇海。综合经济志与各经济分志是整体与局部、综合与分析、战略与战术的关系，《综合经济志》以各经济分志为基础，从宏观上展示一个地方的经济总貌，揭示总的规律，对各分志有统帅和指导作用，反映的是战略问题。各分志从局部详细具体地说明《综合经济志》，为战略服务，反映的是战术问题。

方志中设《综合经济志》是时代的要求。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时代，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就要求我们把经济作为新方志的主体记述，改变过去的传统思维方式。一个地方（县以上）的经济门类在方志中占有一半以上，自然地体现了主体作用。《综合经济志》在这个主体中就更显出了它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从方志的适用性来看，方志的首要作用是资政，新方志的主体是经济志，经济志中起最大的资政作用的莫过于《综合经济志》。因为党和政府对于发展一个地方的经济，总是站在宏观的角度、战略的高度、总体的格局来鉴历史，研究以往经济的发展变革，探讨其中成功与失败，得与失的原因，

认识其概貌，揭示其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掌握利用其规律，结合本地区经济的特点，权衡利弊，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经济战略，进行新的总体格局，实行新的有效的宏观调控。而不是首先从微观上战术上探讨一个地方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律。

为什么要定名《综合经济志》，不定名《经济综述》或《经济管理志》？对于这三个名称试作一番比较，谈点个人粗见。

《经济管理志》从经济管理学着眼，侧重于管理，强调管理科学的综合性，但是，一定社会的经济管理总是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形态，一个地方的国民经济是三维性结构的立体，总体，有其总的面貌和总的进程，管理是相对总体而言的管理，在方志中不能重管理而轻实体。而且方志是边缘科学、百科全书，方志科学比管理科学有更大的综合性。因此，《经济管理志》内涵嫌小。《经济综述》即经济概述从体例上来说是“述”体而不是“志”体，从方志学角度反映宏观经济及其管理，“志”体比“述”体恰当。《综合经济志》以志书的体例，综观全局，通过资料科学地排列与组合，反映宏观经济实体及调控体系，内涵平衡，领属得宜。因此，我们主张定名《综合经济志》。

二

在《综合经济志》中必须注意运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各年段的科学排比，这就要从一个地方自然条件、资源条件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因而构成独自所有的经济优势与劣势，通过翔实的资料科学地排比出是否正确地发挥出优势，扬长避短，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优先安排到符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最优经济效果的部门和产品上，形成该地区最优势的经济结构，为党和政府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

济，进行宏观经济决策提供可选择的方案。这就是编写本志的宗旨和本志的功能。

在《综合经济志》中，必须注重反映各时期的经济效益，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效益存在于任何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下，在记述社会主义经济中，尤其要浓墨重彩反映经济效益，因为它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核心，一切经济工作的中心。这就要运用国民经济效果（经济效果即经济效益）指标，如社会劳动生产率、消费基金率、建设周期指标、能源利用效果指标、基金产出率等指标，从生产、建设经营管理、人民生活等方面反映一个县各时期国民经济效益。

县级经济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部，宏观和微观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宏观所管的主要是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生产过程、全局效益，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社会生产力，经济增长，物价对象，及宏观调控体系、手段。使用的资料不同，《综合经济志》以宏观为前提，使用整体的、综合性的资料，不用各经济分志使用的某项具体资料。所用的指标不同，《综合经济志》主要用综合经济指标，反映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总貌和总过程，发展速度和水平。如用社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消费基金、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职工工资支出等综合经济指标，这样才能避免与各分志交叉重复。不能以见微知著来反映微观经济活动。也不能以其它经济分志不能用的资料，都放到《综合经济志》中去写，《综合经济志》不是兼收并蓄，收下脚料。

三

《综合经济志》是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存志书的体例，总撮经济诸志，基于上述问题，新编《蓬安县志》在农业志、工业

志、交通邮电志，林业志、畜牧水产志、蚕桑柑桔志、商业志、粮油志、财税志、金融志、城乡建设志等十二个分志之首设《综合经济志》，以横排竖写的体例，分四章十五节，其章节序列层次如下

第一章 经济水平

第一节 生产水平

第二节 经济效益

第二章 经济结构

第一节 所有制结构

第二节 产业结构

第三节 农业结构

第三章 人民生活

第一节 农民生活

第二节 居民生活

第三节 劳动就业

第四节 城乡储蓄

第四章 经济管理

第一节 计划管理

第二节 物价管理

第三节 工商、计量管理

第四节 财政、信贷管理

第五节 经济监督

以计委、经委、农贸办、物价局、工商行政管理局、标准计量等管理局、统计局等综合部门的工作范围，全志大体分两部分。

第一章至第三章为第一部分，反映本县经济发展的总貌。主要记述各历史时期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部局（含生产工具的更新）经济结构状况。经济发展的速度、水平、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为主线。勾画本县经济发展总的进程及盛衰起伏的大势。从社会生产的主要环节生产、流通、分配（含积累）、消费本身的内涵及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来安排章节。如国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我们都作为专章来写，因为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从国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高低来体现经济水平的高低。第四章为第二部分，反映本县宏观经济管理。重点记述国家管理经济的体制、职权范围，管理制度和政策、措施，宏观管理的内容及管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管理中的成功与失误，以便揭示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然趋势。

在记述经济结构上，除从纵向反映各时期生产关系的变革外，从横向主要反映本县宏观经济的主体结构。如经济成分、产业结构（主要生产部门，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五大生产部门，农、工、建、运、商），农业结构等，尽量从宏观上考虑，这样才符合志书猎其大要的要求。

带县的市志怎样写

市带县的体制，虽然已经将城市与农村划为一体，但它们又是个各自不同的经济实体。城市既然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那么市带县的体制，就是以城市的中心作用，去带动县、乡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县、乡只是城市的辐射圈。将各县的志书内容不加选择，不进行详略的剪裁，那么市志就突出不了本市的特色，反而会使志书成为大量的县志重复。

（摘自《河南史志》88·3 王倩文）

地 方 志 书 的 纪 年

梁 滨 久

时间是地方志书记载史事的必要因素，而纪年则是时间因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谈纪年，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用中国历史纪年还是用公历纪年的问题。有的以辛亥革命划线，辛亥革命前，用中国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后，一律用公历纪年。《关于编写〈天津简志〉的若干具体规定（初稿）》就是这样规定的（《天津史志》1987年第1期）。有的以解放为界，规定解放前用旧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新编（《仙居县志·凡例》）。但一般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区分。建国前，用中国历史纪年，建国后用公历纪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有一个例子写做民国38年（1949年）。从历史习惯考虑，后一种纪年办法比较合适。

对在辛亥革命前或建国前是否采用中国历史纪年，是有争论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说，“凡历史纪年”要“依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并“应注明公元”。有一种意见认为，新编地方志应一律用公历纪年，如必要，可适当注明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理由是：几个政权并立情况下，写谁的年号，意味着以谁为“正统”，这是尊奉古人的“正统”宗法观，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用中国历史朝代纪年，还有一些不好处理的情况：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个民族政权并存的局面，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纪年习惯；还出现过农民政权与地方阶级的政权分庭抗礼的情况，农民政权也启用新年号；还有些事件带有国际性，近邻

朝鲜、日本、越南也各有自己的纪年。这种复杂的情况，有时使纪年很不好处理。另外，用历史习惯纪年，还有不科学不准确的地方。如现在以正月为新年之始，而秦至汉初以十月为岁首，武则天用十一月开头，王莽却以十二月起首，有时同一年的事要分扯成两年。所以，应用公元纪年。用公元纪年，不分亲疏内外，也不涉及政治倾向，直截了当。（见《广西地方志通讯》1986年第5期陈绍嘉《新志书宜用公元纪年》一文）笔者认为，采用历史纪年，确有一些技术上的具体问题要考虑，比如，一般应以中央政权的年号纪年，但存在几个不相统属的并立政权时，可以本地所属政权的年号纪年。但地方志是以史实为基础的科学文献，采用中国历史的习惯纪年，主要是为了与历史记载保持一致，省去查阅核对资料时的换算之劳，并不存在奉谁为正统的政治观点问题。

用中国历史纪年，主要须把握好三点：即朝代、年号和在中国历史纪年后括注公历纪年。

朝代。可简写为秦、汉、唐、宋、辽、金、元、明、清等，不必写秦朝、汉朝、或金代、明代等。朝代名称一般不可省去。有的志书直接写隆庆六年、康熙四年，是不合适的。应写“明隆庆六年”、“清康熙四年”。中国历朝年号有复杂的情况，同一个年号，有的甚至先后出现过七、八次之多。如“太平”纪年，吴会稽王、赵殷、北燕冯跋、柔然伏名敦可汗、南朝梁敬帝、林士弘、辽圣宗、徐寿辉都用过。如不加朝代名，容易引起混淆。而且也须照顾对年号不熟悉的读

者。但在上文已指明朝代的情况下，朝代名可以略去。新编《肇源县志》写：“清朝政府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郭尔罗斯后旗巡防局。”“光绪三十一年前的“清”字可以省去。在同一章节中多次出现同一朝代年号，朝代亦可略去。如“清光绪四年……光绪六年……光绪十四年……”，如不引起歧义，年号也可略去，写做“清光绪四年……六年……十四年……”。

年号。朝代之后写年号。历代朝代年号一般只写年号，不必写帝王号。如无年号才写帝王号，如“秦始皇二十六年”。

括注公历纪年。在中国历史纪年后括注公历纪年。如明永乐二年(1404)。有的志书在括注的公历纪年前加“公元”后加“年”字，有的不加“公元”但加“年”字，有的“公元”和“年”字都不加，直接写公历年份数码。现在，全国还没有统一的规范化要求，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的《编辑工作手册》写做“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有些书如《黑龙江古代简史》写做“(金)天辅七年(1123年)。”《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写“东晋升平四年(360)”。而“规定”有几个例子，在括注的公历纪年前有“公元”二字后有“年”字，如秦文公四十四年(公元前722年)、“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九月二十四日(清咸丰十年九月二十日，公元1860年11月2日)。”但这个规定是对数字用法的规定，而且还是“试行规定”，国家语委也说可“灵活变通”(见《陕西地方志》1988年第4期《国家语委给解师曾的复信》)。所以，笔者认为，只要在一本书中用法保持一致，是写做(公元1404年)，还是写做(1404年)，或是(1404)，都是可以的。但地方志书应象打电报那样“惜字如金”，为简略起见，以只写公历年份的数码为好，这并不影响时间概念的明确性。

历史朝代年号在同一节中多次出现，而

时间接近，又便于推算时，则不必屡注。如“清光绪五年(1879)……十年……十四年……”。新编《仙居县志·凡例》规定：“本志的历史纪年，解放前用旧纪年，但在该节的第一次出现时夹注公元。”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夹注公元，是一种节省文字的好办法。

其次是数字用法问题。原则上应按“规定”第2条第1款办：“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时刻”用阿拉伯数字，“夏历和中国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中国民国纪年和日本年号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而关于民国纪年，解师曾同志有《民国纪年应用汉字议》，理由是：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民国年号，会造成解放前历史年号表述的不统一。此议以信函方式写给国家语委。国家语委复信说明了关于民国年号使用阿拉伯数字的缘由。同时又指出：“编辑史书(包括地方志)，大量引用旧著，为了与正文一致，把民国年号改用阿拉伯数字会造成许多麻烦。比较妥当的办法是：一种特定的出版物(比如××县志)在编写体例上可以自行规定，民国七年十月十日中的数码一律用汉字，但写成民国七年10月10日的办法不够协调，最好不用。这也是符合《规定》的‘灵活变通’的原则的。”(均见《陕西地方志》1988年第4期)所以，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和汉字都可以，但不能混用。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大事记的纪年表示法。在使用中国历史纪年时，一般是先写朝代纪年，然后括注公历纪年。但大事记从古到今都是按年序一直排下来的，为保持纪年的一致，在使用中国历史纪年时，可以先写公历纪年，然后括注朝代纪年，新编《绥化县志》就是这样用的：“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绥化厅60%的人口发生霍乱病，死亡率占发病率15%。”然而有的志书的大事记是按朝代(如新编《渭南县志》)或按古代、近现代分期编写的，已无求统一的必要，那就按纪年的要求去写。

试谈如何用十三大精神指导修志工作

沿河县志办

杨通福

如何具体运用十三大精神指导修志工作，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必须回答的问题，笔者就此谈谈以下十一个问题，借以探讨求教。

(一) 实事求是，反映历史本来面目的观点。“实事求是”是十三大精神的核心，我们修志工作必须始终坚持这一精神。对历史事物，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如实反映，不粉饰，不篡改，功过兼记，得失并书。例如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所造成的失误，过去多主张“宜粗不宜细，宜散不宜集”，主要是怕影响党的形象与威信。现仔细想来，如实记载历史，不搞人为分割，反而更能体现党的伟大正直和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同时又增强了志书的科学性和可信感及其资治、教化功能。本来许多东西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早已公布过了，例如对文化大革命，《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既然党的决议已经公布了，为啥对本来要求存真求实、秉笔直书的地方志，反而要躲躲闪闪搞人为分割呢。只有如实记载，才能保证资料的完整系统和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

(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生产力的观点。这是在正确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就必须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观念，把注意力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各项工作的标准以及总结经验教训的依据。例如过去一个时期连私人养蜂、种“三地”、养大牲畜、竹器、编织等正当家庭副业，也被当着发展资本主义加以限制，束缚了群众的手脚，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各级干部均想抓好生产，有时亲自组织带领打夜战，场期一再调整，五天~七天~十天~十五天。还实行全县多数场镇一天赶，意欲减少时间与劳力浪费，结果粮食还是上不去。从1950年至1976年的27年间，沿河县粮食总产在54万担至97万担的占10年，100万担至135万担的占13年，144万担至150万担两年，只有一年达184万担。1977年至1985年的9年中，全县所有场期恢复五天一场轮流赶的旧制，除1981年在97.9万担外，其余八年均在152万担至199.4万担之间。实践证明，任何阻碍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充分发挥，是无法使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的。

(三) 坚持改革开放的观点。对修志来说，主要是如何反映改革前生产管理体制中各种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弊端，说明改革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也是人民群众的愿望，势在必行。否则，改革就没有现实意义和必要的客观基础，同时应突出反映改革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并用鞭达的手法，反映各种干扰、破坏改革的卑劣行为。此外，实事求是

地反映引进资金技术，打开商品销路，扩大流通渠道，促进横向经济联合等方面的实际效果。以说明开放的必要性。

（四）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既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又须承认目前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必要性、这是由各种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商品经济发展。象过去那种盲目求纯的做法，等于作茧自缚。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违背了有竞争才能发展的规律。修志就应反映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那些企图否定公有制的做法和所引起的恶果，应用事实说话的方式，加以批判。所谓有计划，是指在总体上和全局上。加强宏观控制和计划指导，避免放任自流，任其盲目发展造成的大起大落。只有对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如实加以记载，才能充分发挥资治功能。

（五）坚持维护安定团结的观点。应具体反映文革时期的大动乱，对工农业生产造成的破坏和对党、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使人们从中懂得：安定团结就是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必要前提，从而自觉珍惜它，维护它。同时，必须反映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维护安定团结所做的大量工作。以及所取得的显著成绩。以展示任何破坏安定团结，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罪恶活动，都逃不脱人民的惩罚。

（六）坚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观点。注意多记那些克己奉公、损己为民、尊老爱幼、遵纪守法、尊师重教、优生优育等先进人物和事迹，以示尊崇。对于那些伤风败俗、违法乱纪、损公肥私、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胡作非为、迷恋封建陋习陈规、抱残守缺一类丑恶现象，须抓住一些典型事例，用批判的笔调加以反映。让人们从美丑比较中懂得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积极学习，努力工作，才是一个符合社会需要与人民群众利益的人。

（七）坚持依靠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我们以往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极为丰富深刻的。例如在领导农业生产上，不讲科学态度，只强调冲天干劲，盲目蛮干、瞎指挥，搞万亩包谷山，大量陡坡开荒，深耕三尺，越密越好，不问自然条件如何，普遍推广双季稻、结果都是事倍功半，事与愿违、欲速不达。甚至劳民伤财，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水土流失，气候反常，不少井泉干涸、土特产品收入锐减等严重后果。如实反映此类教训，可使后人引以为戒，同时对许多依靠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成绩和经验要如实反映。例如推广双杂、改良土壤、兴修水利、适当深耕、合理密植、间作套种、扩大复种面积、精耕细作、合理施肥、陡坡退耕还林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使后人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到教益，取是舍非，兴利除弊。

（八）坚持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观点。要振兴经济，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发展快慢与水平高低，取决于人才的数量和素质，而人才又来源于教育。因此，应多记载一些真正重视、关心支持发展教育事业和对直接办好教育、培养人才有突出贡献的人和事，以利后世效法。同时对于象文革中，随意批斗师长、打乱教学秩序、破坏仪器设备，搞乱了学生思想、耽误了一代人等悲剧，也要如实反映。借以垂训子孙。

（九）坚持实行经济责任制的观点。经济责任制是一种科学管理方法，要反映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和发生的重大变化，同时反映过去集体生产期间，由于管理不善、评分不合理、生产效益低、群众收入长期上不去的一些典型情况，使之前后照应，上下衔接，以增强志书的科学性。